

ZHONG GONG DANG SHI SHI ER JIANG

中共党史 12 讲

王金池 王志均 主编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中共党史 12 讲

主 编 王金池 王志均

副主编 傅克俊 陈利民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京)第164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党史12讲/王金池、王志均主编。—北京:北京
农业大学出版社, 1993.8

ISBN 7-81002-525-2

I. 中…

II. ①王… ②王…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教材

IV. D23-43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二号)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印刷厂 印刷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50千字 印数: 1~2000册

定价: 3.40元

目 录

第 一 讲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 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1)
第 二 讲	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16)
第 三 讲	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35)
第 四 讲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 中流砥柱·····	(54)
第 五 讲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	(71)
第 六 讲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95)
第 七 讲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113)
第 八 讲	“文化大革命”及其历史教训·····	(130)
第 九 讲	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147)
第 十 讲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66)
第十一讲	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全面推向前进·····	(185)
第十二讲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是党的胜利之本·····	(205)

第一讲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1921年7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个完全新式的、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犹如撕裂黑暗的旭日，喷薄而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迫切呼唤着工人阶级政党的出现，同时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条件。

一、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社会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长期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国家。1840年，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此后几十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不断地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魔爪遍及中国大地。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政治上，中国丧失了主权。外国侵略者操纵了政治实权，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太上皇”。他们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行划分势力范围，大力扶植中国封建军阀势力，支持军阀割据和混战。中国虽然还保持着独立国家

的名义和形式，但实际上已丧失了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国家地位，沦为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上，外国侵略者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他们一方面用大量商品倾销和资本投入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基础，刺激了中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另一方面又极力支持和维护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并没有导致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然保持着，而且在经济生活中占明显优势。中国封建社会逐步演变成为半封建社会。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社会，灾难深重，异常黑暗。

国家的主权被剥夺，领土被瓜分，财富被掠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百年间，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沿海主权、海关自主权、关税自主权、邮政和对外贸易权、司法主权等，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掀起了一次次瓜分中国领土狂潮。英国霸占了香港和九龙半岛，葡萄牙割去了澳门，沙皇俄国攫夺了东北、西北150多万平方公里，日本强占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德国把山东沦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以战争相威胁，迫使中国将许多港口及城市辟为商埠，并设立具有“国中之国”性质的40多处租界。神州金瓯，残破不全，满目疮痍。帝国主义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鲸吞战争赔款和其他款项达白银1000亿两。仅《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

丑条约》等8个不平等条约，就勒索赔款19.5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中国财富源源流入西方列强之手，本来就落后的中国，更加羸弱不堪。

国家四分互裂，封建军阀混战频仍，割据不已。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扩大在中国的利益，互相争夺，各自扶植封建军阀作他们的工具，支持军阀割据和混战。尤其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中国各派军阀，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为了争夺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凭借手中的武力，彼此间频繁地发动战争，甚至一年之内就进行几次大规模混战。狼烟四起，战火不熄，国家处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中华民族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华民族蒙屈受辱，被扼杀了生机，濒临毁灭；中国社会经受着无穷的灾难，黑暗笼罩，悲惨黯淡。中国人民不仅毫无政治权利，而且丧失了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其贫困和不自由程度，举世罕有。全国有80%的人长期处在饥饿半饥饿状态。更有甚者，处于饥寒交迫的中国人民，还饱受兵火战乱之苦，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帝国主义的每一次入侵，都有千千万万无辜同胞惨遭杀害，痛遭蹂躏。封建军阀的每一次混战，都带给人民无尽祸害。难以计数的百姓被驱赶上血腥战场，倒在血泊之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其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70%左右。这巨额军费又全部转嫁到人民头上。各种捐税，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几乎无物不课，无处不征。捐税之重，世所稀有。各派军阀竞相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加上军阀战争的烧杀破坏，长期的抢劫虏掠。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渊薮。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具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前途在哪里，希望在何方？中国的先进分子不断地探索出路，广大人民一次又一次地英勇抗争。

二、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政治的腐败，是近代中国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社会中，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国家要独立，社会要发展，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进行改变现状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正是在中国近代社会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中国近代革命发生和发展起来了。

农民阶级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多次英勇斗争，其中声势最大的是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19世纪末期的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1851年开始，前后坚持达14年之久，势力扩展到10多个省，建立了农民政权。洪秀全等农民领袖，把西方基督教的平等学说与中国农民等贵贱、均贫富的愿望相糅合，提出了绝对平均主义的救国方案，试图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社会。1899年蓬勃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斗争。义和团的斗争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攻打帝国主义教堂，拆毁帝国主义修筑的铁路、车站，破坏帝国主义控制的矿

山，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农民阶级的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中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阻滞了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步伐。但是，在国内外强大敌人的联合绞杀下，农民阶级的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

民族资产阶级发起了连绵不断的救国斗争。19世纪末，随着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和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逐步成长起来，登上历史舞台。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了戊戌变法，初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掀起新的救亡图存运动。他们幻想在不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不触动帝国主义的情况下，依靠光绪皇帝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挽救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四邻交逼”，“瓜分豆剖”的危险局势，兴民权，开民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顽固派和一切封建守旧势力极力阻挠，破坏维新运动，扬言“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对维新派举起了屠刀。终于，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103天，就以康梁逃逸、六君子喋血而告结束。本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了比较完备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政治纲领。孙中山等人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屡仆屡起。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辛亥革命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而且，革命果实很快被封建军阀头目袁世凯攫取，国家统一的局面随之被军阀混战。

所代替，从西方引进的民主政治制度很快变成了军阀官僚争权夺利的工具。正像孙中山所痛心的看到的那样，辛亥革命虽然“去一满州之专制”，却“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后通告海内外同志书》，《国父全书》第3册，台北1973年版，第567页）

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历史在证明：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中国农民，有强烈的斗争觉悟，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力量。但是，农民与旧的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相联系，并不代表新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受视野狭窄和思想保守的历史局限，提不出有远见的斗争纲领，不能独立完成革命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限制，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也一再进行着民族民主革命，但是，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推翻封建势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673页）因而，资产阶级根本没有力量，也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行到底。

在经历过农民战争和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依然尚未完成。历史判定，无论农民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责任。旧民主主义革命即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进行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必须进行新的革命；这个革命必须有新的领导阶级，必须走新的道路。

这就是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中国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 的逐步结合

中国近代社会里产生的第一个新的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使得大批手工业者破产；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封建剥削的加强，造成了大量农民的破产。19世纪50年代前后，这些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进入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所办的工业企业，转化成第一代中国工人。19世纪70年代，伴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出现，在清政府和中国民族资本家兴办的军事企业和其它工业中，又诞生了一批工人。中国工人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资格更老些。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在逐步发展。到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快地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19年已达到200万人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最进步，最有远

大前途的阶级。除此以外，成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还具有特殊的优点。第一，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更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因而革命性更强；第二，由于中国近代工业大都集中在沿海各省和少数大城市、大企业，产业工人的分布相当集中。这就弥补了中国工人人数少的缺点，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团结，便于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量；第三，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与农民结成联盟，发动和组织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些特点，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特别能战斗的最革命的阶级。还在中国工人阶级诞生不久，就进行了反侵略、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1858年，香港两万多市政和搬运工人，为反对英、法占领广州而举行了大罢工。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也持续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年到1895年的25年中，全国发生了16次罢工。1895年到1913年的18年中，全国罢工达116次，其中规模较大的还发展为武装起义。从1914年到1919年5月之前短短的5年多时间里，罢工就达100多次。这期间，工人阶级的斗争水平有明显提高，罢工成为经常性的斗争武器，分散斗争向联合斗争发展，带有政治性的罢工增多。

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扩大，中国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不断发展，为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应该看到，到1919年5月之前的工人斗争，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其中的某些政治斗争，是在民族资产阶级提出的口号下进行的，工人组织基本上也还处在原始的状态，受到了秘密结社或封建势力的影

响。这就说明，中国工人阶级只有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起来，充分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转变为自在阶级，才能自觉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责任。

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19世纪末，在中文报刊上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梁启超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朱执信等人都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零星片断的介绍。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这些介绍没有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打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给封建专制主义、封建伦理道德、封建迷信和愚昧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这在客观上为世界上的新思想传入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左翼人士开始以审视的目光看待西方资本主义。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态度是十分热烈、虔诚的。但是，“先生”总是打“学生”的严酷事实，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在实际生活中日益暴露出的种种缺陷，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这一切都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受到极大震动，增加了怀疑，促使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思想、新途径。这些，都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土壤。

1917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令人震奋的现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胜利。这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启示，产生了学习俄国

经验，争取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从此，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是杰出的代表。1918年7月和11月，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世界革命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应当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之后，陈独秀、毛泽东等更多的进步知识分子都纷纷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界开始了有深远意义的剧烈变化。

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开始了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结合。五四运动，是由北京学生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牺牲中国利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出卖国家的斗争开始的。广大爱国学生群众，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之下，学生斗争一度转入低潮。6月5日，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工人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工人举行政治罢工。自此，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了上海，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几天后，上海工人罢工就达到了高潮。纺织、造船、机器制造、卷烟等行业工人全部参加罢工，海员和铁路工人也开始罢工。整个上海几乎陷于停顿。上海工人的英勇斗争带动了全国的工人罢工。在铁路工人比较集中的唐山、长辛店等地，以及九江、天津、南京、济南、长沙、武汉等

城市，都爆发了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五四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发展成为工人阶级为主力的，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了高度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展示了自己特有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开始向自在阶级转变，开始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先进的知识分子也正是在五四运动中，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运动后，北京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邓中夏等到长辛店向工人作革命宣传，通俗易懂地讲解革命道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了广泛传播阶段，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也有了更快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对各种思潮的分析和辨别中，逐渐选择了社会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李大钊在由他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观、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论、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杨匏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和李达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等文章，发表后也引起了广泛反响。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继李大钊之后，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等一大批先进青年和具有

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先后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之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新观点观察中国社会问题，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这个过程中向工人学习，与工人相结合，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标志，中国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出现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1920年8月，陈独秀、俞秀松、李达等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准备，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0月，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在受五四运动影响较大，工人比较集中，同时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武汉、长沙、济南和广州等城市，也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同时，把开展工人工作，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放到了重要地位。他们出版《劳动界》、《劳动者》等工人刊物，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结合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具体事例，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各种劳动补习班、夜校、识字班等，从提高工人的文化着手，进而作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宣传，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培养工人骨干；指导工人建立工会，组织起来，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在中国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的逐步结合过程中，革命的知识分子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实际斗争，与工人打成一片，在思想感情上发生深刻变化，逐步

锻炼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广大工人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觉悟，并从中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先进分子。

四、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备受屈辱，异常黑暗，迫切需要一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经过中国近代革命斗争的长期的选择，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工人阶级肩上。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通晓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规律，并以对这种规律的认识来指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同时也构成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逐步结合，使得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条件日趋成熟。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一批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集聚起来，在实际活动中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增长才干，从而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准备了干部条件。到1921年上半年，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各方面条件基本成熟。

1921年7月23日，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和周佛海等12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齐集上海，秘密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的第一个纲领中规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以无产